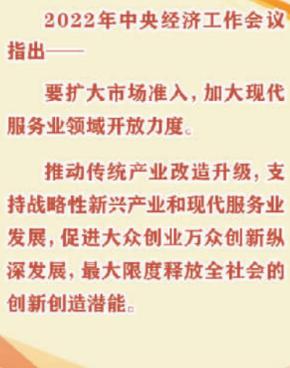


# 有效发挥服务型消费潜力

迟福林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纵深发展，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潜能。

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蕴藏着经济增长的潜力，也蕴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从中长期看，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趋势并未改变。立足现实，关键是推动服务业市场开放，推动一揽子结构性政策调整，加快结构性改革进程，有效发挥14亿多人的服务型消费潜力。

## 把握消费升级大趋势

服务型消费是扩大消费的新引擎。伴随居民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我国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居民消费服务化趋势加快发展，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总体上，服务型消费升级仍是大趋势。从服务型消费水平看，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水平将超过1.8万元。从服务型消费占比看，我们测算，到2025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有望达到52%左右，2030年有望达到55%至60%，到2035年大体稳定在65%左右。

## 发力三大重点领域

加快服务型消费扩容提质，以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也将为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后一个时期，要在供给、需求和制度层面发力，鼓励服务型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助力消费结构升级。

### 第一，着力加大重点领域服务供给。

一是释放居民健康需求。有预测表明，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健康需求将达到数十万亿元。为适应我国居民健康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要加快医疗健康服

务市场开放，推动以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为先导，涵盖医疗卫生、营养保健、健身休闲等的大健康产业发展。二是加大绿色消费供给。我国绿色消费还有相当大发展空间。要把释放绿色消费潜力作为重点，持续提升食品消费绿色化水平，积极推广有机农业发展，加大市场绿色农产品供给，不断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鼓励绿色住房消费，积极推广绿色、低碳建筑，推进老旧小区绿色化改造；抓住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良好态势，提速绿色出行，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一体化发展。三是推动新型消费发展。一方面，鼓励消费业态创新。支持消费领域的平台企业运用新技术探索和打造数字消费新场景，培育更多“小而美”品牌；鼓励发展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推动生活服务智能化，重点发展无接触交易式服务。另一方面，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鼓励“互联网+流通”发展，促进线上交易和线下服务相结合，提供个性化、便利化服务；鼓励商贸流通企业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模式，实现数字化转型。

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发展服务业。要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为服务业平等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以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有效适应服务型消费需求升级趋势，鼓励满足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的新业态发展。不容忽视的是，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加大服务有效供给，需要释放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市场活力，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在强化监管的同时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第三，聚焦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促进制度变革。一是加快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变革，推动服务贸易标准与国际接轨。二是加快有利于提升服务贸易项下货物进出口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制度变革。例如，可考虑简化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科技研发等服务业发展所需原材料、基础设施配套的进口通关手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关键在于稳预期、提质量，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为服务型消费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

预期深刻影响着需求和供给，稳预

期的关键是稳市场主体发展预期。从当前情况看，要稳定消费预期，关键是要加大结构性政策调整力度，采取有效举措，尽快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稳市场主体预期。我国1.6亿多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动力源、吸纳就业顶梁柱。要加大稳市场主体的结构性政策力度，以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保民生、进而稳消费预期。

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关键在于提升服务型消费供给质量。一是在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领域对接国际标准。二是完善和优化居民消费的服务体系。随着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居民对消费服务体系的要求更高。释放服务型消费需求，要在加大服务型消费供给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三是推进市场监管的主要对象由商品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型消费发展的大趋势，既要有规范化的监管，实现公平竞争和防范风险，也要避免用“旧制度管理新经济”，加快探索市场监管理念、模式、技术、手段的创新。建议参照国际先进经验优化监管标准体系，开展服务型消费领域的监管体制改革，实现综合监管部门与专业监管机构的有效配合。

提升服务型消费供给质量，还要加快服务型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快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在形成

# 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创新引领

胡金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未来几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以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关键，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绿色低碳发展打牢坚实技术基础。

一是持续深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发展。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具有明显的高碳特征，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是当前绿色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需要以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破解低碳转型难题。应加大原创性技术创新力度，主动对接国际先进技术，发挥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势，把促进重点技术、关键技术、战略技术的研发与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推广应用节约资源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构建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

二是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全面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生产运营全过程的结合，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产业生态，赋能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借助信息技术催生绿色发展新动能，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提升先进计算等数字优势产业竞争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运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强化对重大工程、重点企业全流程的绿色低碳管理，促进各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三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注重培养引进高端科技人才，调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部门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等前沿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转化渠道，解决一批低碳发展“卡脖子”难题，实现降碳提质并举。同时，还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加大高耗能领域减污降碳技术的研发，实现绿色技术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 以治理体系创新为重点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因此，应坚持系统观念，准确把握环境污染排放与碳排放高度同源同过程的特性规律，明确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目标，以治理体系创新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一是构建市场化系统化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推动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

度，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用水权交易市场，完善排污权、用能权、水权、林权交易制度，扩大碳交易市场的覆盖面，丰富交易品种、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提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跃度。

二是构建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监管体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加强细颗粒物、臭氧等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协同推进湿地修复、生态补水 and 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综合承载力。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推进以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的重要生态空间常态化监管。

三是构建聚焦绿色低碳发展的考核体系。系统全面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体系，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指挥棒”。要继续实施好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措施，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形成良性循环。要完善绿色发展法律法规，促进形成绿色低碳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提高督察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

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以强有力的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发挥制度优势，完善

配套政策措施，推动各方面共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一是加强政策评估和统筹协调，创新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绿色发展的政策评估，打通排污许可、环境准入、总量控制等企业污染源管理政策，推进建立生态环境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机制，从目标、内容和组织等多维度评估现有政策，加强协同互补、配套衔接。坚持先立后破、系统谋划，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绿色低碳转型协调机制，既推动节能减碳，也保障能源安全，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创新实施财税政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完善财政政策和绿色税收制度，通过设立财政专项资金、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措施促进产业实现绿色发展。发挥好财政资金导向作用，统筹整合节能减排、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湿地保护等专项资金，加强对绿色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健全财政金融政策协调机制，通过风险补偿、专项奖励等方式创新，使财政资金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三是创新完善绿色发展产业政策，支持加大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构建与碳达峰、碳中和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完善差别化电价、分时电价和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实施差别定价，加快形成具有合理约束力的碳价机制，推动高耗能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青岛大学党委书记）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一带一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过去这些年，“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无论是在器物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新时代新征程，以惠民生、高标准和可持续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统筹推进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一是深化政策沟通，构建“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网络。我国和国际组织充分沟通协调，形成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广泛国际合作共识。二是加强设施联通。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基本形成，一大批互利共赢项目成功落地，互通互联水平不断提升。三是提升贸易畅通。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着力点，是推动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球贸易增速总体放慢的背景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经贸投资合作不断拓展，贸易方式不断创新，贸易畅通迈上新台阶。四是扩大金融融通。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我国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推动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五是促进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根基和关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民心相通的具体体现。除了自身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一带一路”建设亦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补充和完善。

## 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总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其一，“一带一路”建设以“丝路精神”为指导，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机遇。其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其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瓶颈是实现共同发展的必要条件。互联互通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参与国际分工奠定了基础。其三，多元化合作机制既为不同类型共建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便利，也为“一带一路”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对接创造了条件。其四，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开辟了新路徑。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影响深远。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但仍面临重要机遇。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为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一，以构建健康丝绸之路、推动“小而美”项目建设实现惠民目标。“一带一路”建设第一阶段的重点是以基础设施为主的互联互通项目。这类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的特征。中国推出了健康丝绸之路以及“小而美”项目，这将给普通民众带来直接的收益。未来还要不断深化经济走廊建设，为促进区域发展、提升民生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以构建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实现高标准目标。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展现大国责任担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实践，体现了高标准要求，契合了世界经济绿色化和数字化趋势。

第三，以“硬联通”与“软联通”相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规则与机制化建设是重点内容，要根据合作的需要制定规则、推动机制化建设。面向未来，既要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还要强化制度规则“软联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 农业强国究竟要“强”在哪

涂圣伟

## 中经茶座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郑重提出建设农业强国，必将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什么是农业强国？如何认识农业强国的本质特征？农业强国究竟要“强”在哪？

目前，关于农业强国特征的一般性描述和讨论，侧重于生产效率和竞争力角度，如认为农业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可称其为农业强国。然而，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农业强就不仅仅是一个效率或竞争力概念，而是一个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概念。农业强国不仅表现为农业自身强，而且体现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支撑能力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既有现代化农业强国的一般特征，也存在由自身内外部条件产

生的特定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农产品供需动态匹配能力强、农业价值创造和分享能力强、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能力强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农业强国之强，首先是与农业产出能力强以及供需适配性高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质上是以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作为支撑的农产品供需总量平衡和结构匹配能力。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农产品需求的现实，决定我们必须立足国内解决14亿多人吃饭问题。为此，农业不强，首先要看农业综合产出能力强不强，能不能主要依靠自身保障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如果在吃饭这一基本问题上还受制于人，肯定谈不上是农业强国。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农业强国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同时，如果只是农业产出能力强，而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升级化、多样化需求，这样的农业也不能称得上是强大的农业。基于此，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必然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优化的农业

产业结构、完善的农业产业体系基础上。

除了产出能力强，农业强国的农业价值创造和分享能力也要强。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价值增值能力强，是世界农业强国的核心表现。这些国家人均产出效率、综合效益等主要指标往往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农业普遍具有高效率、高效益特点。强大的农业价值创造能力，取决于高水平农业科技、现代化物质装备支撑，科技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离不开科技创新驱动。与此同时，“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这决定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必然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目标旨向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由此，衡量农业不强，还要看对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带动能力强不强，农民能不能充分参与并分享农业强国建设带来的好处。

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农业强国建设与小国相比有着不同特点。从全球来看，凡是建成农业强国、同时又有较大经济体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都很强。这些国家农业之强，不仅

体现为本国农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强，同时也表现为具备维护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安全、供给全球农业公共产品、制定农业国际规则等方面的能力，以及拥有一批具有产业链整合能力的跨国农业企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必须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全球农业资源配置能力，锻造更具韧性的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从而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更加高效地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此外，不能长期持续的农业一定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强国的农业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从狭义角度来说，体现为资源环境可以承载农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农业发展不能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农业生产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能够有机耦合，农业资源利用率较高；或者是能够以较低的资源代价取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并保持可持续增长。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农业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能力，包括劳动力、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能够优化组合配置，以及政府对农业的合理支持、有效干预和高效制度供给等，从而使农业产出效率能够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进而实现农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